

民间仪式·艺术展演·民俗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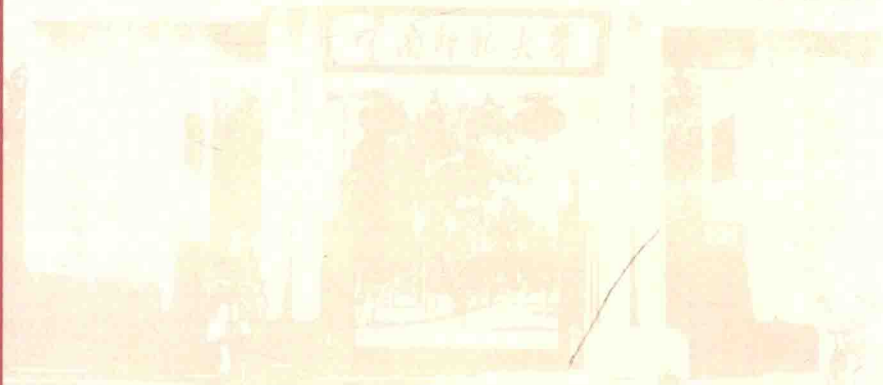
彝族花鼓舞田野民俗志研究

黄龙光◎著



联
大
学
学
术
文
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间仪式·艺术展演·民俗传承

彝族花鼓舞田野民俗志研究

黄龙光◎著

联大学术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间仪式·艺术展演·民俗传承:彝族花鼓舞田野民俗志研究/
黄龙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161 - 5679 - 7

I. ①民… II. ①黄… III. ①彝族—花鼓舞—研究—峨山彝族自治县
IV. ①J722. 22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423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李炳青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字数 342 千字
定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的研究专长是蒙古族文化，在承担招收博士生任务时，对于是否招收南方少数民族的博士确实存在过顾虑。但是当那个毫不张扬且有点腼腆的彝族小伙子在诉说他深造的渴望时，我们结下了师生之缘。

民间记忆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彝族花鼓舞具有彝族祖先崇拜的深刻文化沉淀，它是彝族古代六祖分支迁徙的历史记忆符号，是彝族历史观、生命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多重表述，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专著，以峨山彝族自治县花鼓舞民俗志田野调查为个案，采用多音复调的方式，全面呈现了彝族花鼓舞的历史源流、文化传承及在社会转型期花鼓舞的变迁境遇。

包括花鼓舞在内多姿多彩的民间舞蹈是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学者往往单一地把民间舞蹈视为“艺术”，把民间生活中的民俗舞蹈与民间鲜活的生活隔离起来，很少将其还原于民间生活中去综合研究。记忆是人们关于过去历史、知识和情感的集合体，记忆的形成是一个表象化的行为，其背后具有沉甸甸的历史积淀和信仰凝结。专著重点研究了彝族花鼓舞与丧俗之间的关系。在彝族人的记忆中，跳花鼓是彝族丧仪中重要的文化程式。作者把彝族跳花鼓置于民间仪式中去研究，仪式是跳花鼓的民俗承载形式，而跳花鼓是民间丧葬仪式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花鼓舞作为彝族文化信息储藏库，唤起的是彝族民众的记忆系统。作者以当地彝族丧葬仪式为切入点，通过对花鼓舞“驱鬼、安魂、送灵”仪式展演详尽的“深描”，聚焦记忆主体“人”的情感扭结和情感宣泄对花鼓神灵的阐释，真正体现了民俗学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价值。作者站在民众的立场，努力体悟民众情感，这样的切入和投入，深挖了仪式舞蹈储藏的知识系统，强调了民间知识的合理性。民俗学不同于文献学与历史学，其最本真的存

在是民间记忆通过民众口述探索生活的真实，彝族花鼓舞系非语言文字的肢体动态文化，通过对花鼓舞独特语汇的整体研究，可以探索以往不被人认知的彝族人的生活世界。把民间仪式和民俗舞蹈有机完整地联系在一起，综合展现民族的历史演进、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民俗歌舞、审美情趣整个民俗文化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花鼓舞的价值超越了舞蹈本身的价值，使时空成功跨越，这是专著的价值所在。

作者的研究思路，自始至终遵循着民俗学的学术理念，即通过以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为媒介提取深藏的历史记忆，准确把握其生活世界。民众的生活世界是鲜活、动态的，作者通过驾驭民俗志书写，使彝族跳花鼓研究进入了一个动态的过程。他通过研究过去记忆表象化的艺术化行为，努力通过表象化的历史记忆行动，探索彝族花鼓舞的“原生态”，还原其最本真的面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把握了记忆是想象的、重构的、被创造和被表述的特征，传统的记忆只是修复了的记忆，所以他一方面在追溯传统，另一方面对于传统的现代性和开放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从而高屋建瓴把握传统在现代时空中的延续和变迁。在现实中研究传统，在传统中探寻现代，专著凸显了彝族花鼓舞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建构和表述。作者用实证的方法说明，民间的集体记忆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扩大到国家认同，而在国家认同场域中，民众如何对民族文化实现再认同的过程。他认为，无论是原生彝族丧礼仪式花鼓舞还是现代在天安门展演的花鼓舞都是在多元立体传承语境下，同一群花鼓舞传承主体时空并置操演的过程及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这是作者置于生活世界理念研究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民俗的要义在于传承，传承的媒介是民众的身体参与，而传统的再生产是过去失落记忆转变为当今记忆的过程。作者描述了这种在新的文化场域中民间记忆复苏的态势。对于承载花鼓舞的文化场以及花鼓舞在当代再描述和研究，表现了民俗文化在当代蓬勃的生命力，说明它是推动我们当代再创造的源泉。

作者并不满足于对于花鼓舞这个独特民俗舞蹈的本体研究，它力求在提供一个完整个案的基础上探索民俗学理论。对于民俗学的传承和传播进行全面关注，特别是对“俗民”传承群和个人给予充分关注，思考作为“传者”和“承者”如何具体互动。他们传承怎样的民俗文化信息符码，如何适时应对、调整和创造性传承。把民俗传统置于过去和现在一种垂直

立体关系，不仅仅简单地将传统划定为两端，即传统的给出者和传统的接受者，而是强调传统中的创造性适应。这样的思考，当然有益于民俗学科理论的提升和民俗学科的理论建树。根据我对他的了解，这可能成为这个彝族小伙子毕生孜孜不倦的追求。

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是苍白的，而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南。在此，我祝贺他的专著成为其学术生命的一部分，我也渴望看到他更优秀的著作诞生。

邢莉

2013年12月

于北京魏公村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及意义	(1)
二 研究现状综述	(11)
三 主要研究方法	(21)
四 材料及其使用	(24)
五 相关概念	(25)
第一章 彝族花鼓舞自然人文生境	(32)
第一节 峨山：“长有竹子的山川”	(32)
一 峨山自然地理概况	(32)
二 “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	(33)
三 “彝族花鼓舞之乡”	(38)
第二节 塔甸镇：“花鼓之源”	(40)
一 “一、六”街	(41)
二 “先居之所”	(43)
三 “圣火之地”	(44)
四 “花鼓之源”	(47)
第三节 塔甸村：“长满松树的坝子”	(48)
一 “农村里的城市”	(48)
二 龙潭草海	(53)
三 “五姓公会”	(56)
四 塔甸大庙	(58)
小结	(60)

第二章 彝族花鼓舞的起源	(62)
第一节 民众记忆与口头传说	(62)
一 “花鼓娘娘”的传说	(62)
二 民间“花鼓会”	(66)
三 民间鼓灵神启	(70)
第二节 从彝族历史探寻花鼓舞起源	(72)
一 问题的提出	(72)
二 作为民间仪式的花鼓舞	(73)
三 花鼓舞中的历史记忆	(75)
第三节 从彝母语名探寻花鼓舞起源	(78)
一 问题的提出	(78)
二 从“跳花鼓”到“者波比”	(79)
三 “者波比”溯源	(82)
四 《笃慕罗思则》	(84)
小结	(87)
第三章 彝族民间丧葬仪式花鼓舞	(90)
第一节 彝族民间葬俗起源	(90)
第二节 彝族民间丧鼓舞习俗	(96)
第三节 民间丧礼花鼓舞仪式过程	(101)
小结	(152)
第四章 “开新街”花鼓舞	
——从仪式到展演	(154)
第一节 开新街节俗	(154)
一 “一条街两个村”	(155)
二 彝汉族际传播	(159)
三 小花鼓舞的出现	(162)
第二节 花鼓拜新年	(167)
一 迎送灯神	(167)
二 贺家拜年	(170)
三 “沿街拜”到“拦路拜”	(173)

第三节 “开新街”到“艺术节”	(177)
一 “咪嘎哈”祭祀	(178)
二 艺术节花鼓舞	(183)
三 花鼓舞大赛	(188)
小结	(195)
第五章 从“花鼓飞花”到“花鼓之乡”	(198)
第一节 “花鼓飞花”	(198)
一 “花鼓飞花”	(198)
二 花鼓舞调演	(205)
第二节 校内外的花鼓舞	(216)
一 “阳光花鼓操”	(216)
二 课外花鼓舞展演	(225)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花鼓舞	(231)
一 彝族花鼓舞调查	(231)
二 文化产业规划中的花鼓舞	(238)
小结	(242)
结语	(245)
一 “魔幻与现实”的民俗传承语境	(245)
二 民俗传承主体的兼性身份	(246)
三 民俗传承研究范式反思	(248)
余论	(250)
一 艺术民俗志式调查研究	(250)
二 主体生活串联式民俗志	(251)
三 当代民俗研究范式反思	(252)
参考文献	(254)
附录一 访谈提纲	(262)
访谈内容	(262)

访谈人基本信息	(265)
附录二 彝族花鼓舞队调查统计情况	(270)
附录三 《笃慕罗思则》(即《踩尖刀草篇》)	(273)
附录四 彝族花鼓舞打击乐谱图	(282)
附录五 彝族民间花鼓歌	(285)
附录六 彝族花鼓舞基本步法及动作解说	(290)
一 道具	(290)
二 舞蹈动作	(291)
三 基本套路	(296)
后记	(313)

绪 论

一 选题及意义

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 (Victor Turner) 在调查恩丹布人的伊瑟玛 (Turbwiza) 仪式时发现, 在恩丹布语言中, “仪式”一词叫作 chidika, 它有另外一层含义, 即“一项特殊的责任”或者叫作“义务”。这是与一个理念分不开的, 即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对祖先的阴影表示尊敬……在恩丹布人的理想之中, 一个与身边的同伴和睦相处, 对逝去的亲属心存敬畏的女人就应该结婚生子, 拥有“活力十足、人见人爱的孩子”(译自恩丹布人的表白)。但是, 如果一个女人生性爱吵架拌嘴, 或是有一群爱吵架拌嘴的亲属, 而且“肝中(我们会说‘心中’)忘记了她祖先(她逝去的母亲、外祖母或其他已逝母系长辈)的阴影”, 那么, 她就有被冒犯了的祖先阴影“扎起”(ku-kasila) 其生育能力(lusemu)的危险。^① 远在非洲的恩丹布女性, 因对已逝母系祖先阴影的忘记和不敬, 这种“冒犯”导致自己的生育能力被扎起, 所以要举行伊瑟玛(Turbwiza)仪式。该仪式对恩丹布人来说, 首先意味着一种义务, 是一种后人对祖先表示敬意的一项“特殊责任”。如果不能尽这一份责任和义务, 就会受到不能繁衍子嗣的惩罚。在我看来, 从小耳濡目染的彝族民间花鼓舞何尝不是这样一种仪式, 一项旨在对已故祖先尽“义务”和“特殊责任”的礼俗和仪轨。峨山彝文《道德篇》载, “列玛咋, 哆玛罢, 木觅查玛特”, 其意为“不懂规, 不遵礼, 天地不容人”^②。位于滇中峨山塔甸等地的彝族人, 将民

① [美]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 黄剑波、柳博赅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11—12页。

② 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峨山彝族志》,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第133页。

间“跳花鼓”称为“dzə²¹ pi²¹”，即“跳花鼓舞”，是一种亲人逝去时丧礼上必跳的仪式舞蹈。彝族认为通过跳丧葬仪式花鼓舞，后人才可互惠性地获得祖先赐予的福禄和庇佑。每当村里老人故去，亲朋邻里不仅要主动前去丧家帮忙，人们更是争相观看丧葬仪式过程中打跳的花鼓舞。记得小时候跟大人在出殡路上看花鼓舞，总是怀着一种想看又怕的复杂心情，特别是看到黑漆棺材时更是考验个人胆量，有人甚至因受惊吓而失魂，以致日后不得不行叫魂仪式。即使如此，大人、小孩还是那么喜欢看花鼓。除了丧礼花鼓舞，每年开新街^①时不仅可以安心看沿街打跳的花鼓舞，还可以看耍龙、舞狮、踩高跷等其他民间文娱展演。一支彝族花鼓舞队一般由8—10人组成，展演时由一名手持“箐鸡尾”的龙头师傅领舞，其余三人各持锣、钹、镲在场边列队伴奏，其他4—5人各用红布系一花鼓挎于右肩垂至左腰际，红布带前后各缀一面小圆镜，左手甩动一条白毛巾，右手执槌敲鼓，和着伴奏乐边敲边舞。花鼓舞舞蹈语汇丰富，特别是腿、脚部动作变化大，令人目不暇接，如：蹬、顿、颠、甩收、跳、越；绕花、蹲转、崴膝以及吸腿空转、双脚纵步等，特别如空中崴膝等更是力度大、难度高。同时腰、头等部位大幅度摇摆晃动，动作干净利落、粗犷豪放。

彝族花鼓舞是怎么起源的？为什么在彝族民间传统丧礼上要跳花鼓舞？为什么在开新街这样热闹节庆上花鼓舞要沿街打跳贺拜？这是我从小心里一直弄不明白的问题。现在，不仅彝族村落丧葬仪式上依然盛行跳花鼓，随着彝汉文化交流的加深，就连邻近汉村老人故去也兴跳花鼓舞，而且花鼓舞队阵容和规模越来越大。近年来，当地民间一年一度的开新街，政府结合“原生态彝文化艺术节”一起来组织，节日当天举行“千人花鼓舞开新街”巡演、“彝族花鼓舞比赛”等活动，热闹非凡。塔甸镇更以“花鼓之源”进行地方民族文化品牌的打造。县里则将“彝族花鼓舞”和“彝族花鼓舞之乡”向上逐级申报，2006年同时进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7年年底，彝族花鼓舞开始逐步进入当地中、小学校教育体系，结合课间操来传习。于是，花鼓舞从“彝族的花鼓舞”变成了族际共传的地方花鼓舞。彝族花鼓舞不仅依然在民间丧葬仪式上舞跳以

^① 峨山县塔甸、富良棚、大龙潭等乡镇，每年春节后第一个街天须由附近村落民间龙灯会、花鼓会等沿街耍跳开街，意祈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街市兴旺顺利。

“驱鬼、安魂和送灵”，更是参与到各种艺术展演活动中。同样一群花鼓舞者，有时在民间丧葬仪式上驱鬼送灵，有时在现代文化活动中进行艺术展演。随着政治权力、商业资本等强力介入，彝族花鼓舞自我传承的模式格局发生了改变，民间花鼓舞自身又是如何面对的？

“中国民俗学当中的家乡研究潮流，以其具体的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观念：民俗学实际上就是关于我们自己身边的生活的学问，而不是追逐奇风异俗的猎奇行为。”^①于是笔者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家乡花鼓舞作为选题，试图揭示小时看丧礼花鼓舞“想看又怕”的复杂心情。后来发现要解开产生“想看又怕”复杂心情的原因，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花鼓舞不仅是一种舞蹈艺术活动，更是彝族民间神圣丧仪的一部分。当花鼓舞作为一个仪式时，其传承必然像恩丹布人的伊瑟玛（Turbwiza）仪式一样具有神圣性的一面，对于仪式的执行者来说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当花鼓舞作为一种艺术表演活动时，其变为一种世俗化艺术审美活动，它未必带有责任和义务性质的强制力。“民俗仪式和舞蹈，是该民族的历史演进、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民俗歌舞、审美情趣等多种民俗文化的综合展现。民俗舞蹈以形象的人体艺术动态展示了仪式文化内涵，仪式衬托了民俗舞蹈的文化意蕴，仪式是民俗舞蹈的本质特征。从文献学角度，原生形态的民俗仪式舞蹈，系非语言文字的人体动态文化，它的流传弥补了文字记载历史的不足，具有极其宝贵的历史和研究价值。”^②事实上，彝族花鼓舞是彝族历史记忆、祖先崇拜、艺术审美的一个复合体，具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更是彝族迁徙历史和民间信仰的艺术化动态记录和展示。当代彝族花鼓舞是一个双面仪式舞蹈，神圣与世俗结合，魔幻与现实并置，以民间仪式和艺术展演共同推动着其传承和发展。本书拟以彝族花鼓舞历时和共时双向双轨传承的现状展开叙述，试图对民间丧葬仪式花鼓舞，以及艺术展演花鼓两条脉络的传承进行“深描”^③式挖掘，探讨彝族花鼓舞民间仪式和艺术展演传承及其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本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① 安德明：《家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和支点》，《民族艺术》2004年第2期。

② 纪兰慰：《论民俗舞蹈的仪式》，《民族艺术研究》1993年第3期。

③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第一，推进彝族花鼓舞的民俗学本体研究。

民俗学对于民间传统艺术的研究近几年来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但由于学科自身理论与方法的不足，以及学者自身学术旨趣的不同，对少数民族民间歌舞的传承研究不多。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歌舞民俗文化在当代多元复杂语境下的传承专题研究不多。作为以关注底层民间生活，贴近广大民众，旨在凸显民间主体性为学科特点的民俗学，理应对民族民间歌舞进行专题探讨和研究。“民俗的起源与传播是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存在，这种事实在老百姓那里被当作生活的日常行为而习以为常，不被注意，不受关注。人们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是老祖先传下来的，于是他们就在言行举止之中继承和传递，将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每天在实践，在重复，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和完善。正因为如此，为数众多的民俗事象不曾被圣贤文字描述，更谈不上系统地记录了。这就为我们寻辨民俗的发生与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和困难。民俗由谁创造？又怎样被创造出来？这是民俗学不应回避的问题。从宏观角度看，民俗是民众共同智慧的结晶；从微观而言，几乎所有的民俗事象都无法考证清楚具体的作者，也没有办法弄明白民俗明确的创作年代和明晰的时代背景，这就为民俗起源的追踪提出了难题。然而，起源研究一直是民俗学家关心的问题之一，当他们对民俗文化有自觉的学理意识的时候，就开始了艰辛的探索。”^① 彝族花鼓舞在彝族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融入彝族民间丧葬等各种祭祀仪式中，也渗透在开新街、火把节等各种艺术展演活动中。彝族花鼓舞的民俗学本体研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起源考证和辨析。

彝族花鼓舞的来源问题，康瘦华先生经过田野采风之后，认为“尽管彝族花鼓已姓彝，也尽管它在动态上已有较大幅度变化，但它却实实在在是被彝化了的汉族‘秧老鼓’，并非是彝家的传统文化”^②。1987年印制的《云南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峨山彝族自治县资料集》上载有“1898年左右由甸中石虎村的李国福到晋宁法多（今属晋宁县）一带学回来后……花鼓舞队传入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在最早跳花鼓的几个村

① 林继富、王丹：《解释民俗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② 康瘦华：《彝山舞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中，已经有了五代的艺人”^①。这一小段文字并没有涉及花鼓舞的民族性问题，但因为彝族丧葬花鼓歌唱调却是汉语演唱的花灯调《五里塘》《十二月采花》等，加上由于是“从晋宁学回来”的，所以自此县志、县文化志、文史资料选辑等地方文献均按《民舞集成》上“花鼓外来”说法来撰写。作为峨山彝族花鼓舞主要调查人，李剑锋近年又将峨山县大龙潭司城等地过去汉族唱地灯^②与花鼓舞相比较，“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现在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一现象，到底谁影响谁……至于彝族跳花鼓时为什么唱凤阳花鼓，是不是与凤阳花鼓有联系，有待专家研究”^③。于是彝族花鼓舞又好像和凤阳花鼓搭上了关系。这些有关彝族花鼓舞起源问题的探讨，基本上都以花鼓舞现状特征来进行初步考证，特别是彝族“花鼓”的汉语命名以及花鼓歌汉语唱词等。花鼓舞作为一项传统民俗文化，是历史不断积淀、文化逐渐垒层的结果。探讨花鼓舞起源，必须将其还原到民族历史中过去的生成环境。我们应抛开“花鼓”汉语名称，从花鼓舞的彝语名称“dzə²¹bo³³pi³³”，即“跳鼓”进行溯源。

第二，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个案研究经验。

民俗传承是民俗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民俗传承问题，在民俗学研究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随着当代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变迁的加剧，很多传统民俗文化正在面临着逐渐转型、继承与发展等问题，民俗学作为一门长期关注民间传统文化，以促进民间与官方之间沟通为宗旨的学科，理应对民俗传承给予足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

① 峨山彝族自治县民舞集成办公室：《云南省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峨山彝族自治县资料集》，内部资料，1987年，第94页。

② 在民间逢年过节不正式搭台、任意选宽阔地团场进行演出的地方花灯演唱活动。

③ 李剑锋：《峨山彝族花鼓舞概述》，载聂滨、张洪宾《花鼓舞彝山——解读峨山彝族花鼓舞》，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115页。

而增加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①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为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加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首要的就是必须使其世代相传，也就是说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要的任务，如果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够世代相传了，也就意味着真正成为“遗产”，那么也就意味着拥有遗产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出现问题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就是最好的保护，保护更是为了传承。2006年，峨山县通过逐级申报，“彝族花鼓舞”和“彝族花鼓舞之乡”正式进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彝族花鼓舞能否世代相传，也就成为当地彝族进行身份认同的关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指标是要认真保护民俗文化的传承人及其传承机制，以便保持其传承的可持续发展，并把这看作保护的重中之重。然而传统的民俗学更多关注的是民俗事物和现象，对民俗文化千百年沿袭不断的传承机制和方法手段，却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因而面对如何保护艺人、匠人和传人或隐蔽的或公开的多种多样的传承形式和行业传承机制，民俗学知识与方法显得相当苍白无力。”^②本书通过彝族花鼓舞文化传承的田野调查个案研究，试图调查和研究当代多元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传承实践和过程，以归纳和总结传承的特点和机制，体现出民俗学不逃避社会现实问题，关注当代语境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学科态度，凸显学科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加快，现代传媒的发展与普及，加上许多人为的因素，民间文化及其传承体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某些民间文化已濒临灭绝的危险。许多有识之士对此非常关注，也提出种种对策，如对民间文化资料进行抢救，建立资料信息库，传习馆和文化生态村等等，这些办法对传统民间文化的保护无疑是重要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但我始终认为，这些办法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及其传承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外部的、静态的行为，远离了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缺乏民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转引自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② 乌丙安：《思路与出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中的中国民俗学》，《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间文化主体自觉、广泛的参与。因而，有必要深入到民间文化以及传承体系内部去寻求它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民间文化及其传承体系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去发掘它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的机制，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对外部的适应能力，也就是去寻找民间文化内部所包含的生存智慧。”^①当代彝族花鼓舞处于一个“魔幻与现实”的传承语境，它主要以民间传统丧葬仪式进行传承，并已传播到了临近汉族的丧礼上。由于外来民族文化交流、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的介入，花鼓舞同时以艺术展演等新的方式进行着现代传承。彝族民间传统丧葬仪式花鼓舞，对于笃信祖灵崇拜的彝族来说，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如果在民间丧礼上不请跳花鼓舞的进行“驱鬼、安魂、送灵”，亡灵就不能顺利归祖，也就不能给后代带来福禄和庇护，这是彝族花鼓舞的深层文化内涵。彝族母系亲属关系和花鼓会，则是丧礼花鼓舞主要的传承纽带和传承群体单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彝族花鼓舞艺术展演，因受政府征召而逐步成为当代民俗传承的新方式，在这种新方式下受传者虽以外面主流社会人群为主，但传承者却依然是以民间群体为主。彝族花鼓舞虽可暂时脱离民间土壤到现代都市进行艺术展演，导致一定程度上对民间花鼓舞的艺术化改编和再生产，但花鼓舞艺人们作为民间文化主体，也借机靠近、融入现代生活，展现自我的民间文化符号，反过来促进民间花鼓舞的传承和发展。所以彝族民间丧葬仪式，是彝族花鼓舞重要的文化传承时空，是彝族花鼓舞的“元传承场”。离开了这个作为源头的传承场，不论外在有多大的强力推动，其传承都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显得异常脆弱。所以它是我们进行彝族花鼓舞传承研究关注的核心，但外在各种权力支配下的艺术展演方式传承，也应列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我们在彝族花鼓舞传承调查研究中，同时关注民间传承与外力干预传承两个脉络的真实境遇，试图揭示当代彝族花鼓舞传承机制的真实全貌和特征。同时尽量使自己保持一个文化停调者身份，努力促成两种传承之间的对接，使它们背后的花鼓舞文化主体和政治权力双方，能够互相认清对方和理解对方，在他们之间寻求一种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使官方和商业资本等权威在实施彝族花鼓舞等传统文化的“社会园艺”（Social gardening）伟大工程中避免一些盲目和霸权。精细调查并分析民间和外在权力之间围

^① 张福三：《论民间文化传承场》，《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2期。